

□ “一带一路”与图们江开发研究

DOI:10.19410/j.cnki.cn22-5016/c.2017.01.018

论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交流

魏志江¹ 魏 珊²

【摘 要】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1. 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与丝绸之路区域史;2. 魏珊,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广州 510275)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简称海丝路或MSR),迄今为止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其内涵应该是指从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然后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接着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后经日本博多湾、九州以及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地区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中南半岛南下后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抵达红海、最终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因此,宋丽海上航线和两国海洋经济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丽海上航路与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代表有陈高华、宋晞、吴泰、杨渭生、王文楚、陈炎、祁庆富等学人;^①而国外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韩国东亚大学的金庠基、高丽

大学的李镇汉、金渭显、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学者内藤雋辅、森平雅彦等先生,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文化交流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宋丽海上航路的演变和发展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辽宋丽三国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960-1071年),宋丽海上航线的内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航线。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王朝,之后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

^① 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宋晞《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

东半岛的登州展开交往,从而维持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同样也是利用此条航线。据《宋史·高丽传》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1][14040]}通过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时期的登州,郡名东牟,为现今山东的蓬莱县;八角海口,为现今山东福山县西北的八角镇;芝冈岛,为现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其距离登州约20公里。高丽人归国,亦沿此航路,“先是,武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离登州10公里左右,其虽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给发文据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间以前宋人出使高丽,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启航,并由登州管辖。高丽翁津,也就是现在朝鲜海州西南的翁津;阎州,是现在朝鲜的延安,高丽时代称为盐州;白州,是现在朝鲜的白川。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来,登州一直是与高丽通航往来海上航线的起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时也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3][3829]}因此,自高丽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航线不仅是宋丽海上交通时利用的主要航线,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同时还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来的主要航线。另外,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是此段航线的支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到高丽翁津口后登陆,据《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

天章、宝文阁冯景为高丽国信使,“令排办修补过河船及按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之得二处海道并可发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又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自中国适高句丽,唯明州道经此,若自登州、板桥以济,则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丽之港口,实为板桥镇,元祐三年(1088年)改板桥镇为胶西县,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辽丽两国恢复朝贡关系,在这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朝贡关系也一度中断。1020年后,辽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国灭亡。在这一时期,辽丽两国使节的往来频繁密切,高丽通过以下名义遣使辽国,比如四季问候、谢横宣、谢册封、谢恩、进贡、贺正、贺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辽国则主要通过吊慰、告哀、横宣、册封、贺生辰、来祭、来诏、起复等名义,如此之后,辽丽两国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起来,并且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辽丽之间关系的改善,使得高丽先前结盟宋朝以牵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时已经显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三年),高丽决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号,“复行契丹年号”,并且在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颖等前往宋“贡金器、银厨、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硫磺、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断绝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宋丽两国由于断绝邦交,两国航路基本上亦处于断绝的状态。迄1071年(宋熙宁四年),由于宋朝“联丽制辽”政策的再度实施,宋丽邦交得以恢复,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后一阶段。

后一阶段(1072-1279年),宋丽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航线。关于航路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已多有论及,主要是北宋从国家安保立场,以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庆历年间,特下诏实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莱州进而与辽国经贸易,故登州通高丽海道亦渐废弃。直至宋熙宁四

年(1071年)宋丽恢复邦交,宋出使高丽的海上航路改为明州往返,盖亦由于高丽之请求,《宋史·高丽传》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而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则规定由明州往返。其具体航线,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所载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其卷34至39《海道门》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十分系统、明确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航路和高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等教授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外,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史学科森平雅彦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宋丽航路自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后,经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的虎蹲山),向东航行到达昌国县(今定海县)的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为现在的普陀山)。从这里出海后,进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即从现在浙江沿海、长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①,经夹界山^②,过白山而至高丽。据王文楚先生考订,白山即为现在大黑山岛东南面的荠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荠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7][37]}然而,中国学者祁庆富和日本学者藤田明良均认为,白山为黑山岛西北之红岛,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亦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

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5][75]}而荠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使团先经过白山岛,后抵达黑山岛的往返记载无误,而王氏实误矣;使团由白山所抵达的黑山,也就是现在韩国的大黑山岛,是宋丽时期海上丝路南路的枢纽,也是船舶往来停歇的地方;经过黑山岛,沿群山列岛海岸向北,抵达紫燕岛^③。然后到达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上陆地后,再由陆路抵达高丽的都城开城。碧澜亭,位于现在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在这里停舟靠岸登上陆地,前往开城。从宋神宗熙宁后直到南宋,宋丽之间的海上航路都是经过此段路线,如果能够顺着季风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达。

另外,宋丽海上丝路南路航线的泉州港,也是宋朝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罗拯传》写道“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8][10646]}苏轼亦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中国学者陈高华先生曾经就《高丽史》的记载,归纳出北宋时期泉州海商往返高丽的史料,达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黄谨(为“慎”之误)还充当了宋丽恢复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9]熙宁二年(1069年),黄慎等由高丽返宋,“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诏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还。’”^{[1][14046]}由于宋朝规定:诸赴高丽、日本贸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给予公凭发解启航,即“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即北宋之明州,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丽贸易,显然违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辖之规定,以致苏轼不得不奏请云“元丰三年(1080年)

① 也称黑水沟,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的洋面。

② 又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现在的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是中韩两国的领海分界处,也就是中国与高丽的海上分界线。

③ 即现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处于首尔东南方向,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现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岛。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朝鲜历史地理》(卷二)。

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札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10] 459)}然而,根据陈高华先生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明州商人不过三起,数量上远低于泉商十五起,盖“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戡者甚众。”^{[11] 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 448)}徐戡,泉州海商,苏轼说他: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0] 459)}又谓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戡“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11] 445)}苏轼让他从明州回国,但是“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12] 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故而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11] 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虽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丽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认民间海商由泉州赴高丽贸易者亦多。不过,由泉州出港,驶往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应该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着明州往高丽的航路往返。南宋时,由于海外贸易发达,泉州成为了北上连接明州和高丽,向西连接广州、粤东,从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区的商船常常往来于此。不过,与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来停靠的港口,在与高丽海上往来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二、宋丽海洋贸易与物质文化交流

宋代对外贸易发达,宋丽贸易亦多于海上进行,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是宋丽两国之间海洋贸易与物质文化交流的主要体现。

(一) 关于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宋丽两国最基本也是最传统的贸易形态,两国都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朝贡贸易的机构,比如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宋朝在临安府(今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广州、泉州以及密州板桥镇等地均设置了市舶司,另外还在澈浦、华亭、温州等地创置了市舶场或市舶务。市舶机构掌“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其中,掌管往来南海诸国海上贸易的是广

州和泉州市舶司,掌管往来高丽、日本等东北亚地区海上贸易物品的则是明州和杭州市舶司。所以,主要是由明州和杭州市舶司管理宋丽之间进行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市舶司主要负责的贸易事务为:对高丽朝贡物品的检验、解运、收纳、交易和处理等。宋初,高丽朝贡物品均需交纳京城,但是,随着元丰三年(1080年)《市舶法》的颁行,其中规定朝贡品中除细色须运转京师交纳外,其余粗色等物,一律由市舶司就地出卖,以其价格申报朝廷。就宋丽朝贡贸易而论,仁宗天圣以前,朝贡品多由登州府检视和运转朝廷;熙宁以后,由于登州通高丽航路成为禁途,故主要由明州市舶司检视,根据货物之粗、细色,或转运京师;或就地发卖,然后将其价值奏报朝廷。宋丽之间的朝贡贸易品之交易,一般由朝廷三司和太府寺办理,元丰三年(1080年)以前,宋对高丽之朝贡品,采取估计回赐制,即对贡物估算其价值,然后予以回赐;元丰三年以后,开始以定额回赐制取代了估价回赐制,是年正月,宋神宗下诏谓“高丽国王每朝贡,回赐浙绢万匹,需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有伤事体。宜自今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永为定数。”^[13]南宋时期,虽然规定市舶司对诸番国朝贡品实行抽解和买之制,但是,这些规定并不适用于高丽,宋丽朝贡贸易仍旧沿袭神宗旧制,以浙绢万匹回赐高丽。

此外,关于宋丽朝贡贸易,高丽王朝制定了相关制度用来管理王室朝贡贸易,负责中国皇帝颁发的诏书以及领受来自中国皇帝的恩赐,此外,还对中国海商设置了专门的驿馆。高丽大、小府司的负责事务主要是收纳、处理来自中国皇帝赐予的物品以及向中国王朝进方物等。高丽通过海上航路运到中国的贸易品主要是衣褥、铜器、折扇、银、药材、螺钿漆器、狼尾笔、人参、麝香、松子、草席、苧布、香油、松烟墨等,而中国通过海上航线运输到高丽的贸易品主要是瓷器、玉器、茶叶、乐器、药材、沉香、金银器、笔墨纸砚、鞍马等,以及各式各样的绫罗绢纱等丝织品和赐予高丽国王的鞋靴、衣带等服饰类物品。由此看来,两国间的交易不仅包括主要交易品,即手工业品和土特产品,还有少数部分如香料等物品是从南洋转运而来,这说明此时东亚海上贸易网络已经形成。

(二) 关于宋丽海商经营的民间贸易活动

在新罗时期,张保皋海上贸易集团崛起于朝鲜半岛东南端的莞岛,是东亚海上最大的贸易集团,曾一度垄断了东亚的海上贸易。到了十至十三世纪,宋朝海商组成中、小型船队,从东南沿海北上,经由淮河入海口航行渡过东海,前往高丽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宋朝海商成为当时东亚海域内最活跃的海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东亚海域的秩序。高丽设置有清州、四店、忠州、利宾等四座驿馆作为专门接待宋商的落脚点,宋商到达高丽之后,在高丽礼宾省的安排下,就入住在这四座驿馆中。宋商在高丽主要从事的贸易活动分为“朝贡”贸易和民间自由贸易两种:第一种指的是与高丽王室之间直接进行的“朝贡”贸易,相关活动可以在《高丽史》中见到,书中记载为“献方物”等,当高丽国王收到后,再以方物数倍偿还于宋;第二种指民间的自由贸易。宋商进行的民间贸易在当时的高丽并没有形成统一固定的市场,“唯以日中为虚,男女老幼、官吏工技,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5][10]}而且,高丽也没有制定抽解和征税制度,只有在宋商返航之时,为了防止违禁物品出境,高丽的监察御史要负责对宋商船进行检视。此外,高丽也对宋朝进行海外贸易,高丽商人以王室为首,主要依附于高丽使团以及搭乘宋商船只进行对中国的海上贸易,其中明州是丽商在宋进行贸易的主要地方,高丽交易的贸易品有银、铜器、漆器、螺钿器、苧布、绸缎、折扇、草席、高丽纸、松烟墨、狼尾笔,以及人参、麝香、松子、香油、药材等物品,主要用来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药物、丝织品、香料以及书籍、玉器、木器文具、佛教用具等各种物品。

三、宋丽海上人文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交流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宋丽两国之间物质文明交流的桥梁,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和精神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学术界关于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在人文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交流也多有论及,作为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无疑当首推杨渭生先生的论著。鉴于宋丽两国海上文学、艺术、制度文化、典籍与人员往来等交流,杨著已经做了较为系

统、全面地论述,故作者在杨著论述的基础上,仅就宋丽两国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海神信仰和典籍以及儒佛道三教文化之交流等情况进一步加以论述:

首先,随着宋丽海上航路的开拓,两国海民相互形成了共同的宗教海神信仰意识,成为此时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涵,其主要体现为宋丽两国都存在着祭祀东海龙王和观音崇拜等信仰。据徐兢《高丽图经》记载,宋使团抵达定海县后,“先期遣中使、武功大夫容彭年建道场欲总持院七昼夜,仍降御香,宣祝于显仁助顺渊圣广德王祠。神物出现,壮如蜥蜴,实东海龙君也。”^{[5][118]}而高丽亦有祭祀东海龙王之信仰,徐兢等抵达高丽群山岛时,见“近西小山上,有五龙祠、资福寺”抵蛤窟抛泊,“其山不甚高大,民居亦众。山之脊有龙祠,舟人往返必祀之。”^{[5][118]}蛤窟,即急水门西之甲串,位于江华岛北,今属龙津郡,盖其祭祀龙王之所在也。龙王主风雨、海上有波涛之险,故祭祀东海龙王以保佑航海之安全。又,徐兢使团由普陀山出海前,亦举行了盛大的祈祷观音菩萨的仪式,“二十六日戊寅,西北风劲甚。使者率三节人以小舟登岸入梅岑。旧云:梅子真棲隐之地。有履迹瓢痕在石桥上。其深麓中有萧梁所建宝陀院,殿有灵感观音……旧制,使者于此请祷。是夜,僧徒焚诵歌呗甚严,而三节官吏兵卒,莫不虔恪作礼。”^{[5][72]}故航海前,宋官民必拜祭观音菩萨以护佑其航海安全,而海上拜祭观音,亦是高丽海民之信仰,徐兢记载宋丽航路之菩萨占,即是丽人海上命名之岛屿,谓“是日午后,过菩萨苦。丽人谓其上曾有显异,因以名之。”^{[5][76]}可见,宋丽两国通过官民航海往来,形成了祭祀东海龙王和观音菩萨崇拜等共同的海上信仰,并成为了宋丽两国海上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其次,在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增进了两国人文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于海上来华,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赐予高丽《大藏经》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赐予高丽使节《密藏诠》、《逍遥咏》和《莲花心轮》等佛经。淳化四年(993年),应高丽之请,赐儒家《九经》于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应其所请,再赐予《九经》、《史记》、《两汉

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圣惠方》、诸子、历日、御制诗、《国朝登科记》等。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高丽使来贺哲宗即位,哲宗应其所请赐予《文苑英华》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进奉使尹瓘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1]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王蝦、吴延宠回国,宋徽宗又赐高丽国王《太平御览》一千卷。除宋朝廷赐予外,高丽使节还被允许自行前往书肆购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国子监许卖《九经》以及其它经史子集诸书给高丽使节。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华严经》各一部,诏从之。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哲宗不顾苏轼反对,允许高丽使购买《册府元龟》以归。宋丽典籍交流还体现在高丽大量高僧、留学生以及宋朝商贩于宋朝购买书籍以献于高丽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高丽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购买了《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以为高丽营造有关庙堂之参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丽时献给高丽国王图书579卷,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戡等二十八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版,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献《太平御览》,高丽奖励其白金六十斤。

随着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高丽也有诸多书籍传入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4]故次年(1092年),高丽使即献《黄帝针经》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说苑》,由高丽献出后才得以补全完整;还有已经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通过高丽重新输入到宋朝。加强了两国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宋朝与高丽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

在两国《大藏经》之交流、僧侣的往来和中国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教义对高丽佛教的影响等。其中《大藏经》等佛教典籍的互赠和交流影响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戡,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①而高僧人文往来,则主要是高丽僧人谛观、义通以及高丽王子义天到宋朝的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天台宗相关典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高丽僧义通也被后人尊其为天台宗的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是在宋哲宗时期来到中国的,他遍访名山古刹,带来的大量华严宗典籍弥补了中国华严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拜杭州慧因寺的净源法师为师学习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义天还请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讲解天台教观之道,其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多卷,在高丽弘扬天台宗、华严宗,提倡“教观兼修”,主持高丽国清寺,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因此宋丽两国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文文化交流的内涵。

此外,随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高丽除科举取士外,还实行僧侣的科举考试制度,称为僧科制度。僧科有预备试和正式试之分,预备试主要在各山门或宗派内进行,预备试合格才能参加国家正式大选。大选也有禅宗选和教宗选之分,禅宗大选一般是在广明寺的禅宗僧侣中进行,教宗大选则于王轮寺在各教宗僧侣中进行。如果禅、教大选合格,就授予初级法阶大选,然后按照如下法阶晋升:禅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而高丽时代的僧职主要是僧录司,僧录司有左右两街,两街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掌管一切佛教活动,其渊源显然是受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随着宋朝儒佛道三教传入高丽和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儒佛道思想对高丽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丽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台宗的创立。高丽太祖以

① 《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编》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戡。”

佛教立国,但是,佛教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断,尤其是以海印寺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两派水火不容,相互攻击。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门户之争,从宋朝回国的义天大师提出了“教禅合一”、“教观兼修”的主张,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但两者各有偏执,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内心观照;禅法则强调内心作用而无视外部修炼,故“学教之人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人好忘缘而内炤。并为偏执,俱滞一边,其犹争兔角之长短,斗空花之浓淡。”^{[15] (452)} 因此,义天提出“教禅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禅宗的关系上,义天主张教宗融摄禅宗,并对“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法颇有微词,其提出禅宗本义是“籍教习禅”而非“离教习禅。”其实,义天的“教观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深受中国华严宗高僧圭峰、晋水和清凉大师的影响,华严宗即主张“教禅一致”,尤其是清凉大师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相互契合,并认为华严宗靠经典义理解悟、洞彻法界,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解悟过程是一致的,因而华严宗与禅宗是相通的。义天大师不仅与上述晋水(净源大师)相互往来切磋佛法,而且,对华严宗经典颇多研究。在儒佛道的关系上,义天十分重视三教合一,尤其是对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扬。其主张“得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通观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15] (452)} 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响。此外,十二世纪末期,郑仲夫、崔忠献等武臣之乱,高丽教宗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205年,高丽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寺,高僧知讷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本创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张“教禅不二”,但与义天主张“教主禅从”不同,而是强调“禅主教从”,在具体修行方面,主张“定慧双修”,从而将“渐悟”和“顿悟”统一起来。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觉禅师的影响,知讷融合儒家的忠义,提出禅宗的“忠义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异而实同。”从而体现出三教融合和诸宗汇通的倾向,此与中国佛教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显然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发展,可以说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山东半岛的登州

(今山东蓬莱)沿岸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宋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达,而且也体现了宋丽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贸易品和高丽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流,也承载着两国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 [1]脱脱《宋史·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 [6]苏轼《东坡奏议·登州诏还以水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7]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 [8]脱脱《宋史·罗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 [9][韩]郑麟趾《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 [10]苏轼《东坡奏议·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11]苏轼《东坡奏议·论高丽进奉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12]苏轼《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二),神宗元丰三年正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14][韩]郑麟趾《高丽史·宣宗世家》,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 [15]义天《讲兰盆经发辞》,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责任编辑 张克军]

in this period have been centered on “protecting and constructing a strong socialistic country”.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Cold War has been full of all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artistic quality has declined to be the second of standard of literature; instead,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quality has to be the first. Influenced by this ideology, literature of R. O. Korean has mainly been criticized and deni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Ideology, Korean literature in DPRK and R. O. Korea, cultural manipul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ee In – Lo’s Chinese Poems and Chinese Scholars

Jiang Xia, Yin Yunzhen

(Chu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Lee In – Lo is a very important poet in mid of Goryeo Dynasty of Korea. He has written more than 1500 Chinese poems; yet it is a pity that most of his poems are missing, and only some of the poems collected in Po Xian Ji, Bu Xian Ji, and Dong Wen Xuan are left. By studying about 110 poems left now, we find that Lee In – Lo not only positively imitated some Chinese poets such as Tao Yuanming, Li Bai and Su Shi, but also creatively expressed his own interests, ideas and emotion in the subject, theme, characters and words in his poems by borrowing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Meanwhile, he also expressed scholars’ contradictive situation of “retreating yet not willing, being an official yet not offering” in the reign of Wu Chen and embodied obvious subjectivity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Lee In – Lo, Chinese poem, Su Shi, Tao Yuanming, contradictive situ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Guo2 and Its Counterparts in Korean

Liu yingm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uncovers the common featur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guo2 on the one hand and its counterparts in Korean on the other, namely, “-(ㅁ) n tʃək/il i itta/əpta”、“-a pota – ass” and “- ass – əss”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of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s in Chinese and Korean, arguing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Key words: Chinese, Korean, 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 comparative study

On MSR between Song and Goryeo Dynasty and Marine Culture

Wei Zhijiang Wei Sh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a route between Song and Goryeo Dynasty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Maritime Silk Road in Chinese and Korean history. This route has covered from Dengzhou(Penglai today), the north part of Shandong Peninsula, to Ongin(Haeju today), Korea. Later, the route changed from Songmingzhou(Ningbo, Zhejiang today), to Yesonggang (West of Kaesong today). Maritime Silk Road between Song and Goryeo Dynasty not only embodies the prosperity of two country’s trade business, but also carries their friendly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sea route between Song and Goryeo Dynasty, marine cultural exchange